

儒学入滇的千古佳话

赵崔莉 陈力

云南，位于中国西南边疆，自古便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瑰宝之地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汉、彝、白、傣等26个民族共生共荣，佛教、道教、原始信仰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，共同谱写着波澜壮阔的文化交响曲。儒学，作为中原文明的瑰宝，其在云南的传播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，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，成为连接边疆与中原、凝聚多民族共识的文化纽带。

儒学入滇的四重历史阶段

儒学在云南的传播，经历了层累的四重阶段，每一阶段都深刻地烙印着时代的印记。汉晋至唐时期，是儒学在云南的初植阶段。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征服滇国，赐予滇王“滇王之印”，令他“复长其民”，并设立益州郡，中原官吏和戍边士卒成为儒学传播的先驱。他们不仅带来了儒家的经典和思想，更将儒家的“重农”思想付诸实践，如东汉文齐任益州太守时兴修水利、垦田开荒。这一时期的儒学，通过军政体系的渗透，与本土的巫鬼文化形成了“儒巫并存”的格局。

南诏大理时期，儒学迎来了佛儒合流的在地化创新阶段。南诏政权在崇圣寺三塔下刻立的《德化碑》，以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依”论证政权合法性，开创了“以佛载儒”的传播范式。大理国时期以儒治国，以佛治心，中原的儒学进一步影响大理，并与大理当地佛教融合，大理僧人喜修儒学，形成“释儒”群体，将儒家“孝悌忠信”等思想编入佛教唱赞，深入傣族、白族等民族村寨。

元明清时期，是儒学在云南制度化传播的巅峰阶段。元代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，首次建立边疆儒学教育管理体系。明代开国元勋沐英镇滇时，重视儒学教育，全省府州县皆建学，文庙数量大幅增加。清代康熙乾隆时期，在西南兴建地方官学，开科取士，推动乡村儒学教化，大力推广了儒学。如雍正推行改土归流，在普洱茶山创设“义学”，要求夷童肄业，推动儒学的普及。这一时期，云南涌现出了许多少数民族士大夫，如彝族袁嘉谷、白族周钟岳等，他们成为儒学本土化的关键推动者。儒学的传播助推了改土归流的成功，也瓦解了土司制度，同时让许多少数民族的底层，既摆脱了土司的统治，也更加认同清朝的统治和儒家文化。

近现代以来，儒学在云南经历了危机与重生的双重变奏。清末新政时期，云南高等学堂开设“经学”与“西学”并重的课程，尝试将儒学“民本”思想与近代民族主义结合。抗战时期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钱穆在大理撰写《国史大纲》，在民族危亡之际重构儒学叙事。改革开放

后，传统儒学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，如建水文庙恢复祭孔大典，傣族村寨兴起“双语读经班”等。

儒学在边疆传播的三重机制

儒学在云南的传播，不仅依赖于制度的推动和文化的融合，更得益于其柔性治理的三重机制：嵌入—吸纳—重塑。首先，文庙政治的空间叙事构成了制度整合的重要一环。文庙是路（府）、州、县地方官学（儒学）与祭祀孔子的庙宇的结合，既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基地，又是推广儒家教育文化的中心，同时还象征着大一统中央的政治权威。云南现存的72座文庙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网络。昆明文庙作为全省学宫中枢，每年举行“释奠礼”时，各府州县学官需“奉表赴省，共襄盛典”。边地文庙则承担“化导夷民”的职能，使“大一统”观念通过仪式展演深入人心。

其次，文化整合通过经典诠释的多元路径得以实现。面对多语言文化环境，儒学传播发展出了创造性诠释策略。文本转译方面，丽江木氏土司刊刻《明史·列传》纳西语译本，将“忠君爱国”译为纳西语中的“崇仁利米”（侍奉首领、爱护族人）。仪礼融合方面，大理白族在中元节祭祖时增设《孝经》诵读环节，彝族祭祀经文《指路经》也融入了“慎终追远”的思想。艺术再造方面，建水紫陶匠人在茶具上铭刻朱子格言，傣族佛寺壁画则将孔子与帕雅雅（傣族创世神）并置描绘。

最后，社会整合通过教育的跨族界构建得以实现。明代云南为恢复礼制教化，创建儒学63所，开办书院65所，在府学专设“夷生额”保障少数民族入学。清代广兴夷民教化“义学”，开启边地民智，如普洱推行“茶山义学”，使茶农子弟能够日间采茶、夜间诵经。这种教育渗透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光绪年间石屏彝族士子袁嘉谷考取经济特科状元，其答卷既阐发了儒家的经济观，又主张因地制宜发展边地实业，体现了儒学思想的本土转化。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密码

儒学在云南的传播，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整合，更生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密码。首先，“大一统”与“和而不同”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价值共识的基础。大理南诏的《德化碑》的民族融合誓言与丽江木府土司的“诚心报国”匾额，共同构建了边疆政权的“华夏认同”。而在民间，儒家“和而不同”的理念与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深度契合，如傣族谚语“一树难成林”呼应了儒家的“群居和一”思想。

其次，碑刻、方志与口述史的共构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。云南现存

的3000余通汉文碑刻构成独特的“石头史书”，记录了边疆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。明代杨慎入滇，编撰《云南通志》《南诏野史》等大量地方史志，此举“上以广国家方兴一统之盛，下以备滇云始末之详”，“边地”逐渐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历史叙述和主流儒家的价值观念。最后，经济生活与治理秩序的空间交融构成了实践纽带。清代乾隆年间创立的普洱茶“同庆号”茶庄以《朱子家训》为管理理念，将商业伦理升华为文化信仰。这种经济实践中的伦理渗透，使儒家价值观成为跨越族际的交往准则。

儒学现实建构的实践路径

当代云南，儒学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展现出新的活力。首先，重构传播话语，从“教化”转向“对话”。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户撒乡，阿昌族村民将《论语》中的思想译为本土谚语，这种“双向阐释”既尊重了主体性，又促进了价值共鸣。云南民族大学开设“儒学与少数民族哲学”课程，邀请彝族的毕摩、纳西族的东巴参与经典解读，开创了跨文化阐释的新范式。

其次，创新传播载体，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推出傣语短视频《孔子的故事》，用“贝叶经”画风演绎儒家思想；红河哈尼梯田景区开发AR导览，游客扫描二维码即可聆听彝汉双语的《孟子》讲解。2023年“数字文庙”项目上线，运用3D建模技术还原明清孔庙场景，吸引了大量年轻网民的互动参与。

最后，拓展跨境传播，构建区域性价值共同体。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，普洱市与老挝琅勃拉邦合作开展“铁路沿线儒学讲堂”，用老挝语、傣语讲解儒家思想。在缅甸佤邦，云南学者协助整理《佤汉对照论语》，当地首领对儒家的“和为贵”思想深表认同。

云南儒学传播史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文化的同质化，而是“各美其美”基础上的价值共识。从南诏国的儒释对话到跨境高铁的文化走廊，云南始终在探索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密码。云南民族多样、文化多元，在几千年的交流交往中，相互包容、和谐共处。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起的今天，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边疆智慧不仅为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方案，更向世界传递着东方文明的中国经验。正如建水文庙那副穿越六百年的楹联所述——“泗水文昭昭日月，杏坛礼乐永华夷”，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。

【作者1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，作者2系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哲学社会科学教研部博士生】

翠湖的历史与诗词楹联

郭超

翠湖之于昆明，犹如西湖之于杭州，每当季夏之时湖中千荷竞放，暖风袭人，信步湖畔，目之所及好似西湖风光，令人常有“闻道钱塘天下胜，阮堤知否是苏堤”的感觉。点缀明明的翠湖，像是镶嵌在市区的一块翡翠，为春城增色添彩。

翠湖原名九龙池，根据清代倪颀所著《滇云历年传》记载“九泉所出，汇而成池，故名九龙池”，坊间也称菜海子，可能是得名于“清回透彻，蔬圃其半”的诗句。1919年筹建公园时才改名翠湖，于是过去相沿的九龙池、菜海子、翠海等习惯称呼便鲜为人知。

翠湖在明代以前，是昆明城外“赤阜不凋，土人于中种干叶莲”的一片沼泽，到明初傅友德、沐英带兵进入云南，改建城池，才把翠湖围入城内。1382年沐英在翠湖西畔“牧马种柳”，效仿汉代周亚夫屯兵细柳营，修建“柳营”作为军事指挥中心。沐英喜爱战马，常在湖边饲洗刷，每当春暖秋高时节，骏马良驹千匹恣意嬉戏，体态各异，曾有诗云：“万柳郁成行，牵来老骥嘶。将军思洗甲，神骏自生光。”洗马河由此得名。而后沐英后人将“柳营”改作沐氏府邸，不仅建起了“台榭浮水面”的亭台楼阁，且沐西平家族十三代人，一直在此过着“金炉次第添香兽，红锦地衣随步皱”的奢靡生活。

明清鼎革之际，大西将领刘文秀进入昆明，把这里作为“蜀王府”，但没有大兴土木进行扩建。直到吴三桂进驻昆明，占据五华山修建宫殿，才将王府范围延伸至此。根据《续云南备征志》中收录的《吴三桂轶事》记载：新府“花木扶疏，回廊空石”，颇见穷奢极欲之能事。吴三桂反清失败，其孙吴世璠称帝，建立吴周，改元“洪化”，王府也随着改称“洪化府”，后因人们厌恶吴世璠，才改为承华圃。

翠湖的中央，原来是一处环境优美的小洲，1692年总督范承勋、巡抚王继文，在湖中心建起碧漪亭，也就是现在的高海亭，北岸还建有“爽爽楼”，使“东面高楼西面廊”的翠湖，出现了“翼然亭子起中央”的景致，成为昆明城中的独特风景，吸引了广大游人，朱庆椿《竹枝词》云：“倒影楼台映绿杨，九池池上好烟光。一湾活水曹家馆，引荷风酒更香。”在海心亭上，匾联较多，其中出类拔萃的有三块：一是黄奎光所写“亦蓬瀛”，字大逾尺，学柳公权字体得其神髓；二是陈达所写“静观自在”四字，学米芾字体颇具意韵；三是孙清彦所写“比象莲花”四字，用画竹法写出，其中“象”字似一片荷叶捧定一朵莲花，可以入画。另有著名楹联三副，其一是黄奎光书“有亭翼然，占绿水十分之一；何

时闲了，与明月对饮而三”；另一副为阮元书“子产舍鱼，溯放生之始；庄周知乐，开转圜之机”，字取汉碑，古意盎然。亭子中的后墙上，原嵌有大理石四块，为春夏秋冬四时风景，其景象生动、尺寸宽大，是难得的精品。由于这些艺术元素的装点，才使“翠湖一名沼，亭台水面浮”初显人文气息。

清代嘉庆时，倪颀感到“一亭之外，别无容膝”，便同僧人雨菴一道，争取工部侍郎蒋予浦的支持，在亭子旁边建起了“莲花禅院”，从此“梵宇宏深，花木幽邃”，可谓“城市别开仙界，楼台妙在水云乡”。彼时云南候补知府陈鹤还于禅院撰写过一副楹联“杨柳映楼台，南诏山川扫慧眼；莲花开色相，西湖水月证初心”。禅院建成后，在其后又开辟了放生鱼池，即现在的“濠上观鱼”，这样“绿水一泓，睡莲三五，放生之鲤，常候游人”之胜，使翠湖景色更加宜人，有诗为证：“踏青仕女未还家，柳外画船映落霞。菜海春波绿似酒，晚风吹散白鸥花。”

清代道光年间，阮元督滇，修筑了纵贯南北的长堤，并架桥三座，南面为燕子桥、中间为采莲桥、北面为听莺桥，参照唐代白居易、宋代苏东坡在西湖筑堤的做法，这就是“阮堤”。还有一道“唐堤”东西贯穿，当中有铁桥一座，是唐继尧于1919年所筑，两堤长堤相互呼应，将翠湖一分为四，湖堤多种杨柳，水中遍植荷花，柳荫怡人、流萤比邻，每年初春，翠湖可谓“东风一夜渡滇池，十里垂柳信早知”；夏秋之交则“绿满汀洲，荷叶田田，藕花盛放，花香水汽，沁人心脾”，让人流连忘返，宛如身至蓬莱瀛洲、琼岛瑶台。

岁月流转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次深挖湖塘，开辟西南岛屿，建造园林楼阁、添置栈道、增设盆景、引种睡莲、举办灯展花展，近年又恢复了洗马河景观，翠湖的景色更加旖旎醉人。今天在翠湖，早晨我们能在“一园晓色溶于烟”的湖畔慢跑锻炼；在“日落碧云收”的傍晚，我们能在园中“闲依栏杆泛晚霞”以此消除一天的疲惫；在节假日可以携亲带友悠然漫步湖堤，共同欣赏“杨柳荫中鱼跳跃，菖蒲深处鸟争鸣”的自然美景。

如今的翠湖不仅是昆明的地标，更是城市里的“生态样板间”。2024年8月15日，翠湖公园迎来全国生态日云南省主场活动，市民和游客共同见证了云南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，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，在翠湖我们随耳听到的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，随处可见的都是历史文化与自然交织和美美与共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共云南省委党校）



档案里的农谚

王天浩

春回大地，万象更新，云岭大地逐步进入春耕时节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，春季正是农忙时节，而开展农业生产，也离不开人们对物候、气候、天气的了解和观测，正所谓“顺天应时”，顺应气候规律和农作物生长规律，不违农时，适时播种，适时劳作，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关键。长期以来，古人通过生产实践、观测、记录和经验总结，形成了言简意赅、易晓易懂、便于流传，且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农谚，这些农谚广泛流传于乡野民间，鲜见于“官方”文书中，但有些农谚却通过当时的“官方”途径被搜集、记录和保存下来，成为历史档案中轻松、活泼、饶有趣味的一个片段：“移树莫使树知。”

“种烟不要巧，勤行中耕除杂草。”

“云从东，有雨变成风；云从西，骑马披蓑衣；云从南，有雨不艰难；云从北，有雨下不得。”

这三条农谚均记录于《云南烟草改进所关于调查搜集上报各地农谚的训令》（1948年8月9日）。关于云南烟草改进所，是1941年成立的负责技术研究、烟草的试种和推广等工作的机构。

该档案详细记录道：“查农谚为吾国农民经验之结晶，颇多适合科学方法，为了本省各地农谚，特发动由各推广区人员就地调查搜集，以供研究。其有关烟草之农谚，尤其应注意。兹为使调查人员易于搜集起见，并举例函令附发，俾资参照……认真搜集呈报……”，因此，这三条农谚成为“样板”随该“训令”一并下发，指导当时的烟草

种植推广人员参照，开展广泛调查、搜集有关烟草之农谚。

“移树莫使树知”，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朴素的自然观、哲学观。“种烟不要巧，勤行中耕除杂草”，突出体现对烤烟实施中耕管理，勤除杂草的重要性。“云从东，有雨变成风；云从西，骑马披蓑衣；云从南，有雨不艰难；云从北，有雨下不得”，是气候农谚的代表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季风气候、低纬度气候和高原气候兼具的多样性特点。

通过《云南烟草改进所关于调查搜集上报各地农谚的训令》档案，也可窥见近代以来烟草在我省推广、种植的历史片段，对于当下发展壮大资源经济，培育优势产业亦有所裨益。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省档案馆）

云南风物志

探访玉屏书院

朱婧文/图



漫步玉屏古城，踏入玉屏书院，龙门牌坊映入眼帘，四条昂首鼓目的石雕龙柱，二十四块藻井花板上的篆刻“寿”字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更显古朴精巧。

玉屏书院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由原陕西布政使朱履捐银7000两兴建，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落成。书院为三进四合院式的建筑格局，木构架榫卯相接，工艺精湛，棂星门“德配天地”“道冠古今”几个大字彰显出书院对先贤文化的尊崇，儒家的道德教化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。

沿中轴线前行便来到讲堂，宽敞明亮，微风习习，这里曾是学子们聆听教诲、名宿鸿儒讲学的地方。讲堂内陈列的《建院宗旨碑》记载着书院曾以童子试选拔生员，授四书五经，重训诂考证。云南巡抚张亮基所题的楹联“规仿考亭，喜鹿洞重开，莲峰启秀；履成工部，看鸿词崛起，艺苑蜚声”，彰显着书院的教育理念。明清时期，石屏人才辈出，书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，15位翰林、77位进士皆出于此。

再往里走，学舍错落有致地分布在

庭院两侧。据了解，其结构为抬梁与穿斗混合结构，能保证建筑的稳固性，砖墙的外层是青砖内填土坯，兼具抗震与隔音效能。远远望着木雕窗棂，仿佛能看到曾经学子们苦读治学的场景。东侧碑亭雕刻的建院文献，见证了书院历史，西侧教习居室保留着山长批注手迹。

时代变迁，玉屏书院也经历了诸多转变。1905年科举废止后，书院先后更名为“官立高等小学堂”“石屏县立高小国民学校”，后又作为异龙中学使用。如今，玉屏书院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既是一处历史遗迹、旅游景点，也是文化传播的新阵地。

探访书院，首先最能从建筑格局去感受一种文化氛围，书院一般是院落式的结构，围绕“书”体现其功能，例如讲学、藏书、在书院的学堂就有读书、论道、辩论、会讲，这种对话式的课堂不是单方面的知识输出，有问答、有讨论，体现出一种互动的师生关系，一种为道而来、为学而来的精神追求和办学理念，其深厚的人文内涵，仍值得我们尊崇和传承。

昆明市宜良县狗街镇金色的油菜花绽放。 本报记者 陈飞摄